

中国地域文学史何以成学

——从学术源起、历史演进到学理建构

葛永海 潘巨强

摘要 中国地域文学史在古典时期形成了“一源双流”的演进格局：以“风骚”为宗，以地域诗文总集与地方史志为互补互鉴的文脉双轨。在“南北文学不同论”等理论观念推动下，地域文学史开启近代转型，1924年杨树荣发表的《潮州文学史》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地域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学史逐渐形成撰述与出版热潮，表现出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层级丰富、视角多元等特点，同时亦面临理论凝滞、结构趋同、畛域模糊、地方夸饰等困境。通过学术总结与检讨，地域文学史成学的突破在于理论层面、路径层面和价值层面三个方向。从地域文学史走向地域文学史学，是学科发展和学理突破的必然，亦是现实驱动的必然。

关键词 中国地域文学史学 学术源起 历史演进 学理建构

作者葛永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潘巨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金华 321004）。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5-0159-15

地域文学史^①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维度，一方面，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多元化、精细化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快速崛起、地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也在倡导普遍化的地域文学史写作。内在要求与外部推动形成双重动力，推动地域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拓展与探索的重要领域。

在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趋势下，地域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有待重新发掘。当前学界常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支，但这种定位未能充分把握其内在学理：中国文学史虽隐含国家疆域的空间属性，却在文学进化论框架下有意淡化内部的地域差异，导致宏观叙事与微观现象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关键意义，恰恰在于化解这一矛盾——它聚焦特定地域的文学现象及其生成空间，检验主流文学史范式的适用边界，并在构建更具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地域文学史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为中国文学的多元解读与多维发展开辟更多可能。

对于文学史学，学界已有共识。文学史学聚焦于文学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强调文学作品的主体性，同时涵盖文学思潮、流派演变及跨域互动等要素，形成由文学史哲学、关注存在形态与演变方式的一般理论和

① 在面对不同地理层级的文学史研究中，“地域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和“地方文学史”是被多次使用的三个概念，它们作为研究对象被讨论时，有时指称的是同一概念，有时在不同视角下，其内涵又有不同。如曾大兴就以“边界”和“地域性”为考量，指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地理边界又比较模糊的文学，就是‘地域文学’；反之，其内部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并不一致，二者之间的融合度并不高，其地域性并不同一，其地理边界又很清晰的文学，就是‘区域文学’”[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与之相比，“地方文学史”则融入了“地方性”与“地方性写作”的理论内涵，更强调去中心化和地方特色。综合比较三个概念，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学史”是当前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学术概念，更具融通性，也更具建构“学史”和“史学”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本文选择以“地域文学史”作为统一表述。

关注研究方法与治史模式的操作理论构成的三维理论框架。那么，次一级的地域文学史能否成学？又何以成学？为了回应这一学术命题，本文拟重审地域文学史的学术源流与演进脉络，跳出“主流文学史附庸”的认知定势，回归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内生生成逻辑：无论是古典的“地理—文学”互释传统，还是近代中西理路的交汇融合，本质上都是依托叙事视角的空间转向实现对“中国文学史”的在地化解构。只有重建这一学术脉络，强化理论自觉，实现关键聚焦，推动对其本体论、路径论和价值论层面的反思与探讨，才能为其范式创新提供本源性支撑，为构建“地域文学史学”奠定必要的学理基础。

一、地域文学史传统的“一源双流”

早在中国先秦时代，有关地域文学史的各种观点就已在文学、史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地带逐渐萌生，这一阶段可称为地域文学史的前形态，呈现为在“风骚”传统下地域诗文总集和地方史志两条并行不悖的学术脉络，可称为地域文学史撰述传统的“一源双流”。

（一）源起风骚：地域文学史的“宗经”与“辨骚”

对《国风》和《楚辞》的崇尚是早期地域文学史观念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宗经”与“辨骚”作为传统^①由来久矣。

“十五国风”经由周代采诗制度的地域实践而形成“百里不同风”的方俗与审美差异，不仅保存了各国风诗“勤而不怨”“乐而不淫”等地域审美特质，构建起黄河流域繁荣多元的文学地理图景，更通过经学阐释赋予其历史发展的逻辑性——汉代毛亨、郑玄以“正变说”阐释《诗经》，将“治世之音安以乐”与“王道衰……变风变雅作”^②的王朝兴衰史投射于邦国文学的好尚变迁中。黄宗羲解读《诗经》，认为“讽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于变风变雅归焉”^③，实现文学分析与时代进程的认知同步。正是这种将地理空间、历史变迁与情感张力熔于一炉的文论传统，奠定了地域文学史“时空并举”的阐释逻辑。

《楚辞》则代表南方文学传统的自觉建构。从屈原《离骚》的巫楚神话溯源，到宋玉《九辩》的失意抒情，西汉严助、朱买臣等辞臣在宫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④，至东汉王逸，更以“与屈原同土共国”的地域认同增已作入《楚辞章句》，完成“楚人注楚辞”的文化循环，形成跨越三百年时空的“楚辞接受史”。这种以乡邦情结为纽带，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⑤为主题的创作传承，赋予荆楚文学源源不竭的自我更新能力，也为后世地域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文脉赓续的典范。

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对地域文学之历史属性的认识在文学发展早期阶段就开始形成，而《国风》《楚辞》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的经典化持续影响着地域文学史的“前形态”，对地域文学史的学术自觉具有深远意义。

（二）地域诗文总集中的地域文学史论传统

地域诗文总集的编纂传统始于唐代，以殷璠《丹阳集》《荆扬挺秀集》为发轫，经晚唐五代《宜阳集》《泉山秀句集》《蜀国文英集》之赓续，初具雏形。至宋代，随着文官流动制度完善与地方文教水平的总体提升，地域总集编纂蔚然成风。据学界统计，宋人辑录之地域总集凡57种（如《严陵集》《会稽掇英总集》

① 孟子的“知人论世”之说为后世文人解读“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人文地理的解读动机，而对《国风》与《楚辞》的文学批评则启发了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中南北并峙的地域文学发展认知。南北文学的地域分野在魏晋以降日益凸显。曹丕《典论·论文》首标“徐幹时有齐气”，既指北海文士铺排纵恣的《齐风》遗韵，亦暗含对地理气质影响文风的自觉认知。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的咏叹，则揭示地域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左思《三都赋序》批判前人赋作“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主张“贵依其本”“宜本其实”的地域书写原则，标志着文学地理真实性的理论觉醒。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文学》以“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概括学术地理差异；刘勰《文心雕龙》更系统建构文学地理理论：《物色》篇以“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解析地方风物感发文学创作的现象，《乐府》篇阐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的音律本源，开辟“地理—文学”互释的学理路径。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从水土禀赋论方言文风：“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与《隋书·文学传》“江左宫商发越”“河朔词义贞刚”的南北二分论互为表里。

②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页。

③ 黄宗羲著，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编：《黄宗羲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④ 班固：《两都赋》，《文选》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页。

⑤ 黄伯思：《校定楚辞序》，《直斋书录解題》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6页。

《天台集》《成都文类》等),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方官吏领衔编纂。经历元代的短期低迷,至明清时期,其编写数量随着各地文人阶层的扩大而达到高峰:明代存世的地域诗文总集逾230种,清代更有1100余种之多,数量冠绝历代。^①总集编纂者虽以网罗散佚、保存乡邦文献为主要目的,但在文献排比的过程中必然要深入接触地方的文学发展史,由此所激发的文学史思考则凝练于序跋凡例之中。

地域诗文总集的文学史思想承继自《国风》《楚辞》的优良传统。明代吕阳《晋诗选雅序》将地域诗统溯源至十五国风^②;清人邓显鹤则于《沅湘耆旧集序》中强调楚辞之于沅湘文风的奠基意义。^③姚佳《诗源初集》更将全国诗脉分为吴、越、豫章等十五家^④,说明风骚精神已内化为编纂者最基本的文史思维。此种“宗经辨骚”的自觉,促使编纂者关注文学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共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地方文体代兴、文法演进与思想衍变的普遍规律。

地域诗文总集编纂的核心方法论,在于以代表性作家为坐标建构地方文学谱系。明人刘昌《中州名贤文表序》以“水之行地”^⑤而沛然莫御的气势为喻,择取贾谊、韩愈、二程、许衡等十二家雄文健笔,勾勒出中原文统的千年脉络。清人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则聚焦“诗学源本”“辟草莱者”与“主坛埴者”^⑥,甄选甬上诗史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文学流派梳理方面,《海虞诗苑凡例》以“虞山派”之间的师友授受关系阐述常熟诗歌的传承统系^⑦,《湖海诗传》则考辨了“皖桐诗派”自梅尧臣至施闰章、韦谦恒的七百年诗学嬗递。^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集编纂者已敏锐捕捉到过境文人与地域文学之间产生共鸣、互相成就的情况:宋人袁说友《成都文类序》指出司马迁“浮沅湘,游巴蜀”而史笔日进,杜甫“上瞿塘,过夔梓”而诗史愈彰,田游岩“自西蜀,历荆楚”而山水情深,揭示客籍文人如何在特殊地域体验和相应创作实践中实现个人思想与文学品位的升华。^⑨

断代文学史的雏形亦在地域诗文总集对当代文学历史的思考中产生。明人范弘嗣在《晋国垂棘凡例》中慨叹海内文选家选辑晋文者少,因此致力于建构明代晋人文章的传承谱系^⑩;王崇简编《畿辅明诗》,认为明代的畿辅诗绪在李东阳、卢楠、王嘉谟、赵南星等名家之间有序递传。^⑪今人张瑞杰考察地域诗文总集之间的联通性、互补性和发展性,提出将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诗文总集进行对照、补充、释读,足以形成以时间线排列的地域文学史编写框架。以晋诗为例,若将《国朝山右诗存》《晋诗选雅》《晋诗续雅》《三晋诗选》等地域选本纵向串联,当可构建一个“初具时间性的地域性诗歌发展脉络”^⑫。

对文化边缘地区的文学史建构而言,地域总集更具“补史之阙”的独特价值。清人张允概在《滇南诗略跋》中钩沉滇南一带的诗史脉络:明季赵玉峰、彭印古承遗民气骨,清初钱熙贞、许贺来启新朝文风,乾嘉时以李因培为翘楚,后学李敬跻、周得寿等承其余绪。^⑬此类论述展现了地域文学史的边缘活力,其他如《粤东诗海》之于岭南文学史,《松风余韵》之于上海文学史,《闽诗正声》《晋安风雅》之于八闽文学史,皆是可资考察的边缘地区文学史史料。

此外,通过编辑诗文总集,还可对地域文学的意象系统和风格特征进行整体考察和归纳总结。《会稽掇英总集序》剖析诗歌意象,指出浙东诗歌的美学系统存在“风亭月树”的士大夫审美与“僧蓝道馆”的宗教审

① 谷玲玲:《地域空间与作品汇编:中国古代地域总集之生成与演进》,《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② 吕阳:《晋诗选雅》,明万历八年刻本。

③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叙》,《沅湘耆旧集》,道光二十三年新化邓氏南村草堂开雕本。

④ 姚佳:《诗源初集凡例》,《诗源初集》卷首,清初抱经楼刻本。

⑤ 刘昌辑:《中州名贤文表》,明成化刻本。

⑥ 胡文学辑:《甬上耆旧诗》,清康熙十四年胡氏敬义堂刻本。

⑦ 王应奎:《海虞诗苑》,清道光十九年王绍文等补修本。

⑧ 转引自周维德编:《蒲褐山房诗话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02页。

⑨ 袁说友辑:《成都文类》,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范弘嗣:《晋国垂棘》,《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第2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⑪ 王崇简:《畿辅明诗》,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⑫ 张瑞杰:《清代山西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65页。

⑬ 张允概:《滇南诗略跋》,《滇南诗略》,清嘉庆己未疑雅堂刊本。

美两大分支^①；《国朝杭郡诗辑》则揭示杭州诗歌“清微萧远”“托想幽靓，发音玲珑”^②的风格共性，认为这一审美取向既是杭郡轻灵风土涵养的结果，也与杭郡诗人普遍的“山水癖”息息相关，彰显地理环境与文化氛围对文人审美的深层塑造。

明清时期更衍生出地方诗话、文话这类地域文学史论的新型载体。清人平步青《国朝文概题辞》总述江西古文脉络：“西江自北宋欧阳、王、曾出，以古文雄长寰中。南渡后有周益公，元有虞道园，明有杨东里、艾天佣，国初有巨源、彭、魏。石庄上掩东乡，下启易堂，空所依傍，一洗晚明纤细通悦之习，与榆墩足称两大，湘帆、轸石尚在下风”^③，其史论的系统性与夹叙夹议的议论形式已十分接近现代地域文学史的相关表述。晚明郭子章首创地域诗话体例，在《豫章诗话》中主张“江西诗派当以陶彭泽为祖”^④，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到解缙、杨士奇，以作品、人品、轶事为线索勾勒出江西诗歌发展演变的源流和特征，标志着古典时期地域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进一步成熟。

（三）地方史志中的地域文学史论传统

史传中首发地域文学史论者当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以屈原为楚地文学开风气之祖，评价其骚赋作品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屈原之后，楚地文学代有所承，“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⑤。《汉书》继而论之，在《地理志》中梳理了楚地文学自战国至汉代的发展脉络。^⑥ 此类论述在历代史传中间或出现，然未成体系，故未形成稳定的书写传统。

地方史志聚焦于主流史传所忽视的地域文学图景，开始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文学史观点。地方史志对地域文学的论述最早可追溯至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此志不仅记录了蜀地受中原文化宣德达教、博化笃俗的早期文学成果，更形成了“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⑦的地域文学史叙事，开创方志书写文学史之先河。然唐宋以前，地方史志以郡国书为主，多聚焦乡贤事迹，宋元方志体例未臻完备，罕有系统梳理文学流变者。至明清方志编纂鼎盛，体例日精，尤重文脉传承，其艺文志遍考诗词赋诸体，探究文体互动嬗变之规律，实为地域文学史通论之雏形。

方志编纂者率先批判“以道统文”的狭隘文学史观。乾隆《隆平县志·艺文志序》直言：“志之文不必尽概于道”，指出以文载道之作实属凤毛麟角，而隆平这类边邑应当以“广收博采，不复计文之工拙”^⑧为准则，方能存录地域文学的真实生态。顺治《招远县志·艺文志序》^⑨进而提出地方艺文的三大编纂原则：一曰不必夸多，反对滥收乡贤平庸之作；二曰综鉴过客，关注客籍文人与本土文学的良性互动；三曰有关方土，强调文献服务于“识山川、验风俗、考政治、表贤达、别物辨土、稽古筹今”^⑩的地域认知。这三大原则为地域文学史书写确立了艺文史料的甄别标准。

在实践层面，方志通过历史分期呈现地方文学的演进轨迹。黄仲昭在《兴化府志·文苑传序》中对兴化文学的发展历程展开论述，认为自郑露倡学以来，莆田文物始有生色，至唐以文行著名者仅有林披、林藻、许稷等人，宋元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要本于道德”，至明朝时，莆田诗学蔚然勃兴且代有传承：“宣德、正统间，莆诸老在翰林者凋谢已尽，惟伟与陈会元中并以文章擅重一时云。……莆之诗学，旧有师承，正统间，渐失其传，莹力以兴衰复古为任……至今莆人诗知浑厚、造澹白，不尚雕刻，莹之力居多”^⑪，早年有王伟、陈中身居郎署，名擅一时，其后有名士周莹赓续乡邦文风，复古振衰，由此清晰勾勒出一地诗风传承与嬗变的历史线索。此外，乾隆《赞皇县志·艺文志序》、道光《晋江县志》等皆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分期意识。

① 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24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428页。

② 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初辑，嘉庆五年守惇堂藏板。

③ 引自平步青：《樵隐昔寮》，民国六年刻香雪庵丛书本。

④ 郭子章：《豫章诗话》，民国十年南昌豫章丛书编刊局刻豫章丛书本。

⑤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1页。

⑥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8页。

⑦ 常璩著，任乃强点校：《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⑧ 袁文煥修：《乾隆隆平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抄本。

⑨ 张作砺修，张凤羽纂：《顺治招远县志》，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⑩ 黄大成：《平乐县志》，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⑪ 周瑛修，黄仲昭纂辑：《重刊兴化府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30—1131页。

文化边缘地区的方志编纂更凸显出建构地方文学历史的文化自觉意识。康熙《畿辅通志·艺文志序》以文学史梳理力证燕赵文学代不乏人：虽十五国风不涉燕赵，然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实开慷慨悲歌之先声；汉有燕人韩婴《韩诗外传》推诗人之意，赵人毛萇注《毛诗》辨析精微；晋张华《博物志》搜今罗古，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文采斐然；唐以诗称，而诗人多出于赵，宋以理学称，而邵康节、刘器之文理兼胜，“顾可曰燕赵无文章哉？”^① 乾隆《正定府志》更详细罗列汉成帝至清乾隆两千年间的常山文人谱系，揭示该地文、史、儒学并重的优良学术传统，探究常山于艺林“啧啧有声”^② 的文脉根基。

就地域文学发展的现象考察与历史书写而言，地方史志与地域诗文总集实为并行不悖、互补互鉴的文脉双轨。《四库提要》称郑虎臣《吴郡文粹》与范成大《吴郡志》为地方文献的一体两面：“是书虽称文粹，实与地志相表里。东南文献，藉是有征；与范成大《吴郡志》相辅而行”^③，《吴郡文粹》辑诗文而存风土，《吴郡志》载輿地而涉艺文，二者“如骖有靳”，通过对地方文脉的不同理解和共同阐发而形成地域文学史的古典传统。

概言之，地方史志对当时的地域文学史研究颇具启发性：其一，在艺文史料的选择上突破“文以载道”的思想桎梏，确立以“广收博采”还原地域文学真实面貌的文献准入原则；其二，在文学史框架层面建立基于文学分期的通论传统，并以此分析地域文学现象的演进规律；其三，在方法论层面与地域诗文总集形成互补、互证的综合参考体系。这种将地理沿革、文体嬗变、人文精神熔铸一炉的地方艺文书写传统，堪称独具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学史原型。

二、地域文学史的近代转型与现代流变

清末民初，在外部西学东渐与内部整理国故的双重思潮影响下，推动地域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学术自觉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同步开启，学者们开始突破传统史论框架，尝试创作更接近主流文学史体式、更具专研意义的地域文学史。这一转型既体现为对古典时期“地理—文学”互释传统的现代转化，又彰显了文学史书写从国家宏大叙事向地方微观层级的视角下移。总体而言，20世纪前半叶的地域文学史研究有三方面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近代转型的理论先声与实践初探。“地域文学史”的学术概念源于林传甲的地理志编纂实践，他在主持《大中华地理志》工程时^④，呼吁修志人员同步编修各省地域文学史，其于《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凡例》中就指出“应别撰……《河南文学史》”^⑤，强调其“以课国文”的学术定位，《大中华江苏省地理志·凡例》亦提出相同观点。这种将地域文学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构想虽因时局动荡而未及实践，却体现出建设地域文学史学科的学术远见。至于其地域文学史与乡贤传、列女传、博物志并列的类目设置，则呈现出古典学术向现代转型的过渡特征。

1905年，刘师培发表《南北文学不同论》，标志着地域文学史理论的革命性突破。该文采用彼时欧洲与日本文学史研究中流行的“环境决定论”分析方法，系统阐释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对南北文学风格差异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⑥ 此论发展了《隋书·文学传》“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⑦ 的南北词人得失论，在传统地域文学史论中注入更多地理与空间思考。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启发下，孙子高以文学谱系的形式梳理出“《诗经》—《二南》—楚辞—秦汉杂赋”“《诗经》—《邶风》—赵赋—秦汉杂赋”^⑧ 这两条南北文学发展的不同脉络，康光鉴则结合人文地理变迁与文学流变现象，指出南方文学始于《候人歌》，在重庆而流变为巴渝歌，由蜀而鄂，发扬为楚辞，再经由江汉而传入黄河流域，深刻影响了《周南》《召南》等《诗

① 于成龙、格尔古德：《康熙畿辅通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② 郑大进纂修：《乾隆正定府志》，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③ 引自魏小虎编：《〈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54—6355页。

④ 宋声泉：《林传甲字号、家世、卒年考略》，《兰台世界》2016年第13期。

⑤ 林传甲纂，林传涛参订，祝宗梁分纂：《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北京：琉璃厂武学书馆，1912年，凡例。

⑥ 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⑦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29—1730页。

⑧ 孙子高：《南北音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文哲月刊》1936年第9期。

经》篇什的美学风格。此后诸如吴家煦《中国文学南北派沿革概要》、朱右白《中国文学之南北宗派论》乃至当代学者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等文章也都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创新精神，其间隐含的地域文化观念、地域向心力及内蕴的群体认同心理标志着地域观念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明朗化。

其次是通史通论的体系化探索。1920—1940 年代地域文学通史的撰述与研究呈现出从传统方志思维向现代学术理念的转型态势。关于地域文学史的讨论最先出现在各类现代地理书、志书或文论专著中。1922 年，学者王传燮在《白话中国地理》^① 中简单介绍了安徽文学从老庄、朱熹到桐城派的发展历程。1932 年李清悚、蒋恭晟主编的近代志书《我们的首都》从“文辞（即散文）”“诗词”“戏曲小说”^② 三大文体出发，简要论述了南京自南北朝至清末的文学发展历程。1935 年，杨启高在《唐代诗学》一书中列举司马相如变楚骚为汉大赋、陈子昂历初唐而启盛唐气象、花间派引领由诗向词的时代转向等重要文学事件，进而说明四川在中国文学史上多次引领风气的意义。1936 年，王培棠主编《江苏省乡土志》^③ 的“文学”一节以历史发展眼光考察江苏文学家在主流文学史中的影响，博涉诗、赋、词、散文、戏曲、小说等文体，不失为一篇精要的《江苏文学小史》。

专门之地域文学史在这一时期亦开始出现。1923 年，学者顾惕胜发表《常州文学之回顾》系列文章，文章开篇就明确提出此文旨在发明“常州一地方之文学历史”^④，然其于历史断代、问题选择等方面的议论颇有可商榷之处，如其绝大篇幅都在探讨清代常州文学、经学、史学的发展历程，此前历代文学史则一笔带过；再如其叙地域文学，颇有门户之见，如“实际阳湖古文之内容，亦较雅健笃实，不似桐城古文之往往空疏敷衍，明眼人自能见之”^⑤。虽有以上问题，但《常州文学之回顾》在形式上还是体现出向专门之地域文学史发展的倾向。1924 年杨树荣发表的《潮州文学史》^⑥ 则可被视为现代第一部地域文学史，该著分唐、宋、元、明、清五章建构潮州文学发展史，每章分两节，分别是对这一时期潮州文学整体情形和重要文学家的介绍，每个文学家都选录一篇代表作，让读者领略其风格。虽然在论述模式上已经接近于当代地域文学史，然“籍贯本位”“主流文学本位”的编纂出发点使其夸大了一些潮州乡土文人的文学影响力，也没有在人物、时段之间建构起潮州文学发展演进和文脉嬗递的逻辑，因而遭致林光耀《读杨君树荣潮州文学史》^⑦ 的专文批评。林氏强调地域文学史需突破方志“表彰乡贤”“美其邦族”的窠臼，主张在“源流分合”“沿革变迁”的文学史框架基础上建立“地理—文化—文学”的三重释读体系，并呼吁将潮州歌册、畚族歌谣等民间文学纳入地域文学史视野。

20 世纪 40 年代，地域文学史的概念开始被各地学者所广泛介绍，贯通时代、综述成就的地域文学史通论进一步涌现。1941 年，胡小石与鲍靓仪发表的《四川在文学上的地位》以汉、唐、宋的朝代分野，得出“汉代文人出自川西，唐代文人出自川北，宋代则偏于川南”^⑧ 的地域文学重心迁移规律。胡小石此后还作有一篇《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⑨，主要分析了南京文学史上山水文学之兴起、文学教育地位之提升、文学批评之繁荣、声律宫体之流行等重要文学现象的意义，还将如《桃花扇》《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戏曲纳入南京文学史的讨论范畴，乃成为“一篇较有分量、较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地域文学研究成果”^⑩。约斋于 1943 年发表的《越国文学史略》系列文章则以《越人歌》为越地文学之先声，从先秦时期越地的贵族诗歌和征人歌谣到东汉王充的《论衡》，再论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越地文士的经学、诗学、赋学成就，提炼出越地文学“于议论则尚翻案，于纪载则尚考异，于立意则喜纤巧，于措辞则喜尖新”^⑪ 的审美基因，彰显地域文学传统的历史连续性。

再次是断代分体史的研究深化。20 世纪 30 年代以降，断代史与分体史成为地域文学史研究创新的前沿阵

① 王传燮：《白话中国地理》，上海：文明书局，1922 年，第 47 页。

② 李清悚、蒋恭晟主编：《我们的首都》，上海：儿童书局，1932 年，第 84 页。

③ 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上海：公民训练师资养成所，1936 年，第 371—372 页。

④ 顾惕胜：《常州文学之回顾（一）》，《国学周刊》1923 年第 23 期。

⑤ 顾惕胜：《常州文学之回顾（四）》，《国学周刊》1923 年第 26 期。

⑥ 杨树荣：《潮州文学史》，《潮州留省学会年刊》1924 年第 1 期。

⑦ 林光耀：《读杨君树荣潮州文学史》，《留京潮州学会年刊》1926 年第 2 期。

⑧ 胡小石、鲍靓仪：《四川在文学上的地位》，《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旬刊》1941 年第 13 期。

⑨ 选自郭维森编：《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2 页。

⑩ 刘保昌：《地域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福建论坛》2021 年第 5 期。

⑪ 约斋：《越国文学史略》，《东南》1943 年第 4 期。

地。1934年，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首创以文学地理视角分析地域诗派源流分合的研究方法，该文将道咸至同光年间的地域诗派划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和西蜀派六大派系。汪国垣认为这些诗派在近代诗坛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能够代表各自地域的诗歌风格和审美倾向。他以道咸至同光这50余年为时间纵轴，论述六大地域诗派在这段时期的创立、流变与盛衰史，也简要地追溯了这六大地域在清以前的文学演变历程。这篇文章反映了汪国垣以“空间”为视角建构文学历史的强烈意识。在汪文影响下，30年代后期相继有陆树柘的《道咸以来的江浙词风》《明代江浙文学论》和蒋瑞珍的《吴江诗史》面世，陆、蒋二人均致力于江浙地区的文史研究，长期在《江苏研究》《江苏月报》《越风》等地方刊物上撰文考据江浙地区的文学家和文学结社活动，他们的研究虽然影响不大，但可作为此时期地域文学史研究蔚兴的一个例证。

对断代与分体史的研究在1940年代促成了多种地域文学史的撰述实践。王秋萤《满洲新文学史料》^①整合《奉天的文坛》《哈尔滨文坛之一瞥》《大连文艺界的今昔》《吉林文艺界》《十年来的小说界》《新诗十年》等文章，由局部到整体，还原东北地区从五四运动到1945年这二十余年间的文学发展图景。其中《新诗十年》结合东北沦亡的实际情况，主张在诗的内容上“特别有置重于‘乡景’或‘乡味’的要求”^②，这显然蕴含了作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文学”移植论的强烈批判。赵图南的《台湾诗史》则以明郑至日据的历史分期为经，以52家诗人的生平、诗作简介、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为纬，形成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地域文学史叙述框架，更特设“闺秀诗人”与“日本诗人”专章，其“以人系地、以地系诗、以诗系史”的严谨体例堪称地域诗史的杰出范本。^③

近现代地域文学史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在反殖民、反侵略的时代语境中被赋予双重任务：他们既要赓续和发扬志艺文、表贤达、别物土的文史传统，更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肩负起“兴灭继绝”的文化使命，为中国文化认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阐明、强调地方文学之根脉的同时，又以强烈的斗争性和批判性鼓舞彼时的革命事业。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不仅为当代地域文学史撰述奠定基本框架和方法论基石，更彰显学术研究 with 民族命运的同频共振。

三、当代地域文学史的撰述热潮与学理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域文学史书写首先历经了一个从民族政治叙事到学科创新方向的学术自觉过程。1959年，刘介以《广西壮族文人文学史概要》开风气之先，其前言详述广西历代文学如何以不屈的意志与民族的乐观精神“歌颂劳动、歌颂革命与斗争”。正文延续《台湾诗史》以历史分期为经，以文人籍贯、生平、作品与风格为纬的学术结构，又在此基础上增置民族与阶级史观的叙事要求，对于“民族的团结和历史的进展”^④有着深远意义。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广西壮族文学》继而问世，聚焦反封反资、革命斗争的时代使命，形成以民族地域文学史为考察对象、以“革命性”“斗争性”为纲的文学史书写模式。这一阶段的三部著作虽有填补民族地域文学史空白之功，然而其政治导向下的评判标准超越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实为特殊时代的文化产物。

8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浪潮影响下探索更具创造力的学术领域。在陈思和王晓明于1988年提出“重写文学史”^⑤主张之前，更具当代意义的地域文学史写作已悄然兴起——1986年出版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将黑龙江文学溯源至原始社会的民族神话，此后历经渤海、辽、金、清的民族交流史话，既勾勒出黑龙江文学逐渐融入中华文学的历史进程，也向上呼应了60年代的民族地域文学史写作。1987年，《临澧县文学志》开县域文学史先河，《台湾文学史纲》则系统呈现了台湾学者在“解严”后的文学史研究成果。^⑥总体而言，80年代的地域文学史著作虽然数量有限，却在历史分期、地域区界等方面做了有益思考，进而为90年代的创作热潮埋下伏笔。

90年代起，“重写文学史”的思潮风靡学术界，地域文学史也迎来了第一波创作高潮，此时期面世的49部

① 李澍田主编：《东北文献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535页。

② 王秋萤编：《满洲新文学史料》，长春：开明图书公司，1944年，第65页。

③ 赵图南：《台湾诗史》，南昌：蕉叶山馆，1947年，目录页。

④ 刘介：《广西壮族文人文学史概要》，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壮族文学史编辑室，1959年，前言页。

⑤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⑥ 刘小新：《台湾区域文学史书写的兴起》，《华中学术》2019年第3期。

地域文学史有效构建起大文化区、省域、市域三级地域体系。通史体例的成熟是这一时期地域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突破,《台湾文学史》《东北文学史》《岭南文学史》《山西文学史》等作品即是此类地域文学史的典型。就创作目的而言,这一阶段的地域文学史还是更多着眼于以往主流文学史忽略的“边缘地带”,如《东北文学史序》中所言,此书是为回答“东北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史自何时,源于何处;东北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其文化能否构成‘史’的体系和形态”^①等问题而作。因此就地域分布而言,这一时期的港台地区依然保持着地域文学史的高出产率,而东北、岭南、西北、西南等地区也踵继相接,且致力于在体例创新方面展开各种尝试。

2000 年以来,国内掀起了编撰地域文学史的热潮。这一时期地域文学史的繁荣与提升文化形象、打造文化品牌、服务地方发展等地方建设实际诉求密切相关,推动其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探索转变为地方文化工程的基础工作。^②这种转变也导致地域文学史数量在 2000 年后激增,总量远超此前,达到 66 部之多。这一时期,我国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几乎都有了专属的地域文学史,巴蜀、荆楚、燕赵等大文化区也成为观照对象,其中巴蜀地区成果尤为突出,《巴蜀文学史》梳理其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则专注于展现两宋时期巴蜀文学异彩纷呈的断代史。

2010 年后,地域文学史编撰快速下沉至市、县层级。这时期产生的 82 部著作中,近半数属于市域、县域文学史。浙江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乡土文献传统成为此类文学史的创作高地,涌现出《义乌文学史》《瑞安古代文学史稿》《上虞文学发展史》《临平文学史》等著作,这种微观视角也促进了对主流文学史所忽略的乡土文人的发掘。经济发达的广东同样成果显著,潮汕、清远、深圳、湛江等多地均推出各自文学史,可见市县区级编撰已成为地域文学史拓展的新方向。

2020 年至今,地域文学史出版速度明显放缓,截至 2025 年仅新增 30 部。过去创作最多的省域文学通史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山水、电影、民间、曲艺、女性等主题新颖的地域文学史。《浙江海洋文学史话》通过开发新的文学地理介质,以海洋小说、海洋散文和海洋诗歌的历史梳理塑造浙江作为海洋与文学大省的地方形象,是近年来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纵观 70 年发展,当代地域文学史的撰述与研究相辅相成,在发展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五大方面:第一,体量扩大。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分体史,当代地域文学史基本都以搜罗穷尽、篇幅敷衍为原则,尽可能丰满过程,补充细节;第二,覆盖度高。当代地域文学史撰述覆盖全国几乎所有具有文学历史的行政区域和文化区域,且始终保持对文学史“空白地带”的高度关注;第三,层级细分。视野向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级拓展,对中国历史上许多值得独立研究的大文化区和较小的地域目标进行文学史的考察和梳理;第四,视角丰富。许多学者尝试在不同体裁和叙事视角下开展地域文学史撰述,丰富了地域文学史的书写模式;第五,地方转化。当代地方文学史写作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意识,旨在增强地方社会的文化认同,推动和提升地方文化转化的经济效益。

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当代地域文学史仍面临理论依托、体例设计、畛域划分等一系列难题,这些问题折射出地域文学史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亟待突破与创新。

一是理论凝滞。尽管创作数量和著作体量较之前的地域文学史大幅提升,但其叙事仍偏重时间维度与公共经验,缺乏地理空间维度的理论自觉。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史论并举”的良好传统未能得到赓续——实践与理论疏离,史论比重悬殊,导致后者僵化为固定的写作规范,未能与 90 年代兴起的文学地理学形成良性互动。^③理论凝滞使地域文学史写作缺乏顶层设计,对撰述体例、分析方法、理论依托、价值定位等要素的把握均无定规,未能形成能凝聚共识、兼顾理实的学术规范。

二是结构趋同。近代以来,文学进化论主导文学史写作,地域文学史也深陷线性发展、历史分期的叙事框架,导致结构和模式千篇一律。即便涉及地域性,其分析方法仍是陈旧机械的“环境决定论”,视文学为

① 刘烈恒:《东北文学史序》,《东北文学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序言页。

② 何光渝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贵州小说史》《20世纪贵州散文史》《20世纪贵州戏剧文学史》《20世纪贵州诗歌史》《20世纪贵州民间文学史》系列地域文学史著作是2000年贵州省出版基金资助的《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项目的产物,而李伯齐主编、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卷本《山东分体文学史》则是山东师范大学科研处“山东文学研究丛书”重大工程项目的一部分。

③ 如曾大兴在《地域文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中认为当代地域文学史写作“地理意识不够强”,梅新林在《文学地理:文学史范式的重构》一文中指出“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也就是要求臻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有机交融”,“反观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直难以臻于这一境界”。

地理环境的被动产物，无视内部多样性及文学对文化空间的生产意义。可以说，当前地域文学史之所以缺乏个性特征，根源在于理论凝滞造成的叙事模式创新不足。

三是畛域模糊。这一问题主要暴露在各类文化区文学史的撰述实践中。中国历史上那些众口相传的文化地域概念，其概念范畴往往随社会条件与历史语境而变，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不能简单视为某些省域或地区的地理组合。面对文化区域和行政区域划分之间的不确定与不平衡，不免各取所需，进退失据，失去地域边界的同时也模糊了历史依据和标准，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地域文学史撰述的通病。

四是地方夸饰。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市域及以下地域文学史的撰述实践中。这类地域文学史往往夸大特定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源自地域文学史的撰述动机，这类文学史往往与地方政府的赞助支持密切相关，是“政治经济需求—学术创作动力”机制驱动下的文化产物，极大影响了文学史撰述的客观性。

在当代地域文学史所面临的困境中，理论凝滞导致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贫乏，并造成文学史的结构趋同与叙事单一化；畛域模糊则引发地域概念的各自为政和地方保守主义，进而导致地方夸饰的现象频发。因此，对地域文学史研究展开系统的学术总结检讨，在此基础上融合文学地理学相关理论进行学理辨思与建构势在必行。

四、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检视与学理建构

就当前学界的研究进度而言，“地域文学史”的学术内涵尚未厘清，相关研究所使用的学术概念缺乏针对性，对其论域的诸多论题缺乏深入思考。^① 本文通过梳理地域文学史的学术源起与演进脉络，从理论自觉、关键聚焦、价值阐发三个维度对地域文学史研究展开学术总结与检讨，进而为学理建构奠定基石。

（一）理论自觉：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范式重构

地域文学史与文学地理学存在共生关系，换言之，文学地理学本应是地域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当下，却是两相睽违、交集不多，因此，未来地域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在于自觉融入集成性、更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② 后者可为其提供超越传统线性叙事的认知框架和时空观念，将空间维度提升为与时间维度并置的研究坐标，使分析对象从“历史中的文学分布”转向“空间中的文学生产”。在文学地理学中，“时代共性与地域个性”“地域的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等多组二元范畴彼此对立激发，形成了与地域文学史相关概念的深度关联，而重申文地关系，强化地域文学史中文学与地理的“对位互读”，则有助于推动地域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自觉。

针对“时代共性与地域个性”的辩证关系，文学地理学提供了时空并置的分析模型。卡西尔有言：“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③ 然而当前的地域文学史写作常盲从历史进化论，为嵌入中国文学史版图而“将区域作家按（文学通史中的）名气、成就大小分为若干的等级，以定其篇幅字数”^④，导致地域文学史在学术结构和社会意义等方面皆成为主流文学史的附庸。理想的地域文学史应当追求在研究方法上促成文、史、地学科融合，在常体写作中探寻结构变体，引入个性化变量，在探索其内生因素（如地方社会发展、风物感召、文学家族传承、地方事件催化等）的同时，兼顾时代文学大势（如潮流文体代兴、文坛风气转移、文化政策变化等），阐明二者相互拮抗又彼此激

① 可参见乔力、武卫华对于建立“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主张。乔力、武卫华：《论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源流与学理观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乔力、武卫华：《论地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学刊》2006年第12期。

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研究随着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而在国内快速兴起。曾大兴对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推进有重要贡献，1989年，他率先出版著作《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2003年，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会通之学”，应当融汇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2006年，梅新林提出文学地理学应当是一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017年，他与葛永海合作出版《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卷），对文学与地理的内在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理论阐释，指出文学地理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地文互释”与“文地互释”建立文学与地理的“对话关系”。在众多学者拓进的道路上，具有集成性、更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正在形成。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④ 李圣华：《明清区域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局限及走向——以近年来地域文学史撰著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发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地域个性”应当被理解为与外界积极交流后呈现的洗练特质，而非自我封闭后形成的保守主义，而“时代共性”更应该解读为时代群体共同促成的一种愿景，而非不可质疑的“绝对意志”。

在“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阐释中，文学地理学突破了强调行政区划的功能文化区的视野局限，主张将重视民俗亲缘性的形式文化区和注重文化心理认同的感觉文化区纳入文学地理的研究对象体系，以此探讨地域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①以功能文化区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叙事在接受度与现实效益方面有其优势，有学者曾主张地域文学史写作应以行政省域为边界。^②但强行将不断变化的史地关系代入现行省域，则明显忽略了地域内部尤其是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而在形式文化区的定义中，受地形阻隔和人口分布的影响，地域内部会自然形成由核心文化区、副文化区、文化边缘等圈层构成的社会纹理，如浙江就可以此由北到南划分为“江南核心文化区”（杭湖嘉）、“浙东副文化区”（宁绍）、“近闽文化边缘”（温南）等圈层，而身处这些不同的文化圈层中，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取向也会形成对应的分野。感觉文化区则进一步将“史籍方志、文学文本和民间认同”^③等要素纳入地域文学分布的考察视野，这有益于建构一个更具阐释力和适用性的地域文学圈层模型。综上所述，地域文学史研究应综合考量功能、形式、感觉文化区对地域文学的有效界定，采纳形式文化区对文学中心区与边缘区文化特征非等质性的判断，吸收感觉文化区关于文学边界应基于文化认同感的观点，不仅要制作作家、作品地域分布地图，比较区内地域创作面貌差异，还要探讨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其他变体如城乡关系、主流文化区与非主流文化区关系等。

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学术语境而言，其着力点有二：一是古今转型之“变”，章培恒教授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命题倡导揭示了文学史研究中通体与变体、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种维度的共同存在，这对地域文学史的学术转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就通变而论，中国文学史要想打通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文学阐释路径，需要考量历史惯性、政治话语、学科关系等复杂变量，而地域文学史则可以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从开始即确立“通史”视野，将地域文学中富有表现力的外在形式与富于生命力的内在机能引申为文学史公式中的变量和不变量，以此探究文学史通变交替的运作规律，考察地域特性在文学古今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条件，探讨这些差异如何从“小传统”即地域文学特性支撑起“大传统”即中国文学史空间转向的宏大叙事。二是古为今用之“用”，即如何在还原和建构地域文学生命现场与优良传统的同时体现文学史的社会功能和现实关怀，为当代创作提供更丰富、更切合实际的思想资源与艺术滋养，并在文旅开发、地方文化品牌塑造等场景中探寻其与当下社会发展的有效连接点与转化机制。

在文学地理视角下对以上几组二元关系的探讨，本质上为地域文学史开启了“文学与地理”关系命题的本体论研究进程。地域文学史的撰述与研究面临的最深层困境，在于长期未能妥善处理“文”与“地”的内在关系：或偏重文献爬梳，使地理沦为面目模糊、功能泛化的分析背景；或机械罗列风物，使文学成为地方文化话语权的简单投射。二者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与互证关系，地域文学史也因此难以摆脱平面化、琐碎化的叙事套路。欲突破此困境，需引入能够真正沟通文本与地点、融通时间与空间的方法论。梅新林、葛永海在《文学地理学原理》所倡导的“对位互读法”^④正具有此种方法论意义，它源自“神话考古”的考古学

① 形式文化区是由于一种或多种文化因素如语言、民族、生活习惯等而自然形成的文化圈，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核心区集中与边界线模糊的特征。功能文化区是根据政治或者某种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区域，如行政区、教育区或经济区等。感觉文化区是人们对于某种文化区域的共同认知，它不仅被地域内的人们所认同，同时也被区域外的人们所广泛认可。参见周尚意等编著：《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8—229页。

② 乔力：《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

③ 刘昌保：《两湖文学：作为整体感觉文化区》，《长江学术》2016年第3期。

④ “对位互读法”概念出自梅新林、葛永海的《文学地理学原理》，该书第十章“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的第四节“意义重释”即重点讨论“意义重释与‘对位互读法’”，在第五节“新体文学史”第二小节“时空互化论”中亦重申了这一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对位互读法的要义在于文学与地理的辩证互释互读，其终极目的则是阐明文学的时间与空间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化关系。它要求研究者兼具文本细读的功夫与田野勘察的实践，形成文本研究与地理现场之间的对话。比如施莱曼根据《伊利亚特》，史诗描述的泉水流向、战争路线与船只泊地，最终在小亚细亚定位并发掘出特洛伊古城遗址，这是从史诗文本（时间叙事）走向事件现场（空间定位）的经典范例。徐旭生则从考古发现出发，结合古史文献以及彼时的各民族聚落情况，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群的空间分布与历史演变理论，实现了从地理空间反观历史时间的宏大建构。他们的研究表明，真正的“文地对话”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意义生成过程：文本为地理空间注入历史深度与情感温度，地理空间则为文本解读提供物质坐标与现场实感。参见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7—1024、1034—1035页。

实践,强调通过文本与地理现场的反复对话与印证,实现从时间中重新发现空间、从空间中重新发现时间,并最终在时空交融中重新揭示文本的深层内涵。

将“对位互读法”系统地运用于地域文学史研究,意味着该领域研究范式与预期阅读体验的重要转向。首先,它强调从千头万绪的线性时间叙事中重新发现文学的空间维度,这意味着应当将地域看作一个活态的、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意义场。例如,研究京味文学,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多少文学家出自北京或多少文学作品描写北京,更需深入分析运河、城墙、八大祥、四大恒钱庄等兼具时代语境与权力象征意义的空间元素如何参与构建文人笔下的京城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京城的文化身份。这种分析必须建立在对特定空间的历史记载与实地感受的对位互读之上,否则只能是雾里看花,无法触及地域文学创作原动力之一的空间动力。概言之,对“空间”的重新发现要求地域文学史在研究内容中加入更多地方本位、空间性的考察要素,即在地化、多元化的文学地理现象研究。杨义教授曾大力倡导“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提出文学地理的研究内容存在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的划分与组合、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这“四个巨大的领域”^①。这些命题可以适应于地域文学史撰述需要而被设置为以下研究对象:就文学史与地理环境的互动而言,可以探讨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及文学反作用于地理环境的机制;就文学主体而言,可以探讨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在地域层面的静态分布与动态演变;就地域性的作用原理和呈现形式而言,可以探讨不同时期地域文学创作中的空间与地理景观,分析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之间的精神联系与情感差异,感知渗透其中的空间记忆、文化认同与家园感;就地域文学史的内外交流而言,可以探讨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的冲突及文学版图的建构。

其次,对位互读法指引地域文学史研究从空间的静态分布中重新发现文学的时间历程。一个地区的文学传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因时代变迁而留下的层累痕迹。通过对不同时期文人关于同一地点的书写进行对位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该地文化意义的变迁史。以“松江”地域的文学书写为例,从魏晋时期吴地文人对千里莼菜、华亭鹤唳的故地风物之思,到唐宋诗人对二陆的风流追慕,到晚明松江汇聚松江画派、松江书派和几社诸君子而文名远扬,再到晚清以来“远东第一大都市”的繁华竞逐,不同时代的文本层层叠加,共同建构了“松江”作为江南名区之雅致情调与作为改革前沿之创新精神的双重意涵。近现代小说中的上海都市空间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异质感,小说家大都致力于揭示西方工业文明侵蚀下的人性异化。但若将近现代上海空间的文学形态归置于其所在的文化地层,便可发现:从二陆代表吴地文人走向成见深重的中原社会,不卑不亢地主张江南的文化地位,到宋元之交黄道婆改良纺织机器与织造技艺,推动松江府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再到明清之际,徐光启积极从学于利玛窦,引领第一次“西学东渐”运动,“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②等被后世引为海派文化之主要特征的精神质素其实早已深潜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地层中。地域文学史的任务,正是要通过细致的对位互读,揭示出这些意义层的累积与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只有从“空间中的文学”到“文学中的空间”不断交替思考,才能不断深化地域文学史中“时空互释”的广度与深度。而对位互读法为此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工具,它倡导的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扎根于历史现场的研究态度,要求研究者在“文”与“地”的持续对话中还原文学创作的生动现场,发掘地域文脉的深层结构,最终书写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空间温度的地域文学史。

(二) 关键聚焦:地域文学史研究的核心维度

在文学地理学融合的语境下,地域文学史的研究对象需聚焦地域性关键文人、地域性关键文本以及地域文学传统三大核心维度,以揭示“地域—空间—作家—作品”之间复杂的作用机制。而在文人、文本与文学传统所构成的“三位一体”关系中,正如当下文学研究对“回归文本”的响应,地域文学史研究又将关键性文本置于三大维度的枢纽位置。

前端是地域性关键文人。时空并重的文学史观必然涉及对文学空间属性的重新发现。克利福德·格尔茨

^①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② 魏承思:《“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提出“文化深描”^①“地方性知识”^②等理论，主张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认识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史固然要记录本地域中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文人（如陆游之于绍兴、唐寅之于苏州、老舍之于北京、贾平凹之于商州），但更应关注地域性关键文人，他们虽未在主流文学史上开宗立派，却在地域文脉传承的关键期发挥薪尽火传的作用，“在渐变与剧变的生活策略中展现文学共同体及创作风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关系”^③。如清初嘉定诗人陆元辅，生当“嘉定三屠”兵燹，“江南百万户烟火萧条，非复往者优游燕乐之时”^④，他以“以兹继前哲，不啻影随形。努力慎终始，莫染世风腥”^⑤为志，积极联络幸存文人，频繁歌咏，其创立的启社和东皋社成为遗民重要聚集地，成为嘉定文坛复兴的关键推手。

过境文人的文化活动能够为地域文学注入新质活力，打破地域封闭性，但地域文学史写作常患对过境文人的“选择困难症”，暴露出对文地关系深度思考的缺失，表现为：将动态游历割裂为静态地域分布，忽略流动性与创作连贯性；为著名文人的过境创作降低门槛，却为深入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中下层文人设置更高门槛；过度重视代表作而忽视地方性创作，忽视更具地域认识价值的文本。对地方而言，过境文人是考察者和施动者，“他们洞察异域，通过他们的视角和偏见反射出他们自己的身份所属。旅行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对谁讲述和讲述什么在许多方面同他们的旅行本身一样富有意义。”^⑥站在过境者立场，“我”与地方的关系具备心理与文学层面的对仗意义：文化心理上，“我”代表“所在”来到“地方”，总是期望“中心—边缘”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地方文学活动中得到体现，这构成过境文人与地域文学史深层互动的基本逻辑。

后端是地域文学传统建构。地域并非凝固不变的文学容器，而是与文学家、作品、文学家族、流派、社团互相给养、彼此塑造的存在。文人与地域、文本与地域之辩，本质是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形成的文学传统、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即一组传承有序、可资今鉴古的文学基因序列。

经由长期地域筛选而形成的文学环境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地方文人开展文学创作的路径，具体而言，包括文体传承、题材选择、意象组合、风格偏好、应用场景等创作要素。如鲁迅探讨“国民性”的讥刺题材与冷峻风格即与会稽历史上的文学传统息息相关——王充首倡“疾虚妄而立实诚”，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展现笑讽态度和讥刺深度，徐渭《四声猿》发扬关心现实、嬉笑怒骂等艺术特点。置身此特色鲜明、场能强大、传承久远的文学环境，鲁迅才能与真实深刻的人性观察、灰色幽默的行文笔触、外冷内热的创作基调产生天然的文学共鸣。近年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等著作相继对各地创作现象背后的文化环境和文学传统因素展开讨论，这正是地域文学史应列以专章的内容。

作为中间枢纽的则是地域性关键文本。传统地域文学史常将地理环境简化为籍贯、意象、氛围等文学分析的背景板，强调其对文学的单向释读，却忽视环境等客体空间经文本编码、转译后融入主体空间的涵化过程。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启示：文学不仅反映空间，更参与空间的想象与建构。考察作品如何影响地域感知认同，以及文学家如何选择、理解、改造地域元素并转化为普遍的艺术表达，可为地域文学史建构更为立体的对象体系。正如对唐代咏长安和咏金陵的诗作进行对比后能够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诗歌表现的典型意义即在于它们与各自的城市/政治文化的互融性，它们表现文化，同时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金陵诗歌是金陵文化之所以成为金陵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在这种文化演进过程中特质被确立时的重要环节，长安文化亦作如是观。”^⑦而这类有着能动反映、主观还原乃至想象改造地域空间形态之文化意义的文学文本，就是地域文学史应当高度重视的地域性关键文本。

地域文学史研究将关键性文本置于三大维度的枢纽地位，这一判断并非弱化文人与文学传统的重要性，

①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页。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③ 张涛：《文学史叙事的空间维度：现代转型、本土化与拓展进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④ 陈瑚：《确庵文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⑤ 陆元辅：《陆菊隐先生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

⑥ 田俊武：《西方旅行文学研究：从湮没到勃兴》，《外国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⑦ 葛永海：《金陵守望与长安放歌：唐代都城诗的审美歧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而是基于文本本身所具备的承上启下、联通主体的创造性与客体的积淀性的独特功能——无论是文人的个体生命体验，还是传统的集体文化记忆，最终都需要通过文本这一载体才得以呈现、传递与重构。关键性文本不仅是文人创作活动的结晶，更是文学传统形成与演化的基本单元，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键性文本是连接文人与文学传统的具体介质。文人作为地域文学的主体，其创作是通过对前人文本的阅读、接受、模仿与超越而实现的，没有关键文本的连续存在，所谓“传统”便只能流于空泛的概念。其次，文本内外空间的交互转化形成了丰富的文学景观，这些景观兼具审美价值及反映地方生活记忆与心灵归属的意义。以浙东文学的乌篷船书写为例，陆游“碧瓦朱甍无杰屋，乌篷画楫有新船”^① 展现水乡恬淡自适；朱彝尊“乌篷七尺屡回首，看到月明归未迟”^② 寄予无限观景心情；周作人品味乌篷船上任意沉浮的清闲，与“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③ 融为一体，浸入水乡。杨义认为：“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④ 充满人文内涵与地方生活印记的文学景观不仅反映地方社群思想价值与审美，也影响着人对自然空间的感知理解，塑造其对自身和世界的阐释。最后，关键性文本被赋予超越个体与时代的阐释延展性，能够有效破解以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史书写困境。德国诗人海涅曾言：“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我们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事件可能非常渺小而平淡，而且通常正如诗人的外部生活非常渺小而平淡一样。”^⑤ 如前文所言，传统地域文学史沉迷于发掘文人身上所谓“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将人的历史无限等价于文学的历史，因而常常陷入“籍贯本位”“过境文人”的选择难题和繁琐无益的生平考证中。而若以关键性文本为中心，将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地域特色与文化影响力作为筛选的首要标准，再由此对文人的行踪游历、文学观、人生观与地域的文学传统进行上溯和下延，则能较好地规避这些难题。

概括而言，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关键路径即在于聚焦具有地域特性的文人、文本和文学传统，在地域文人的选择上应平衡本土性和对外影响力，在文学传统梳理时应注重文学基因的历史溯源与文学史价值的当代激活，同时对地域文学文本关联调摄地域文人和文脉传统的结构性重要意义加以强化。唯有如此，方能形成地方性的文人、文本和文统的“三位一体”，使地域文学史研究真正超越一般意义的作家作品汇编，而成为阐释文学多元生态、接续地方文学传统的重要学术文本。

（三）价值阐发：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地域文学史的发展演进，最终都要服务于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其价值阐发主要体现在三种维度，即地方文学文献的史料钩沉、文学文本的审美重构与地域文化精神的传承涵育。此三维度共同将地域文学史的学术研究 with 地方社会的发展效益联系为一个整体，并以地域文化精神的永恒价值作为学科探索的最终旨归，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文化传承意识。

首先是地方文学文献的史料钩沉。发掘地方文献的文学史料价值是地域文学史的基础目标。古代地方诗文集和方志艺文志是重要的艺术矿藏，唐宋以后文献浩繁，搜辑到的作家作品数量庞大。明清时期，仅苏州一地，乡镇一级的地域诗文总集就有《木渎诗存》《盛湖诗萃》《分湖诗苑》《吴郡甫里诗编》等数十部之多，其中固然有肩负地方文脉传承使命而被主流文学史所忽视的人物和作品，但如何将此类文学遗存转化为鲜活的历史画卷，还需要相关学者的深入考察。近现代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献整理成果同样宝贵，如林培庐《潮州平民文学的历史》记载岭东歌谣研究会调研结果：“梅县刘信芳君搜集有民歌四五十首，普宁李幻云君搜集有山歌（猥褻的）三四十首，卢佚民君搜集有《剪春罗集》一本，谜语、谚语二百余首，合拉因桃生柯枏青民诸君所收集的，总共二千首有出。”^⑥ 然而，《广东近代文学史》《近现代潮汕民间文学》《潮州歌谣谚语集成》等当代文学史著作尚未系统整理此部分史料。

① 陆游：《陆放翁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782页。

② 朱彝尊著，王利民校点：《曝书亭全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③ 《周作人散文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④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⑤ 海涅：《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8页。

⑥ 林培庐：《潮州平民文学的历史》，《中大季刊》1927年第4期。

其次是文学文本的审美重构。对文本审美价值的阐发赋予地域文学史继往开来的情感活力和艺术创造力。地域文学史研究不仅需要梳理地方文化在文学中的表达脉络,更应为地域文学审美提供新视角,激发创作者的文化自豪感与传承创新自觉。风骚以降,书写与塑造地域景观便是文人的当然命题,现代以来,乡土文学、新市民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带来了新的地域文学审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童的“香椿树街”,这些地方印象经成长、改革、生死、理想等哲学主题的洗练,成为社会心灵史的文学映像。近年如《秦岭记》《北流》《燕食记》之类备受关注的“方志小说”,更是强调关注凡人写心、民间传奇等边缘题材,既对地方临场感与个体经验提出要求,又在创作中还原个人与地方的文化关系、表达记忆与成长经历中难以言说的地方情愫,这些问题正呼应地域文学史在新时代的学术使命,即在快速发展的、多元化的时代变革中完成地域景观的重塑,进而激发和重构新的地域情感及其审美价值。

无论是对地方文献史料与故事传说的保存与利用,还是对地方性文学审美的价值重构,最后都应当服务于地域文化精神即一种“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的传承涵育,这也是地域文学史研究所要追求的终极价值。魏禧《容轩诗序》有云:“十五国莫强于秦,而诗亦秦唯矫悍。”^①从《驷驎》游猎到《无衣》军容,秦地文学塑造出筋强骨健的关西大汉形象。杜甫在《兵车行》中悲鸣生民战乱流离之苦,亦不忘赞美“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耐战秦兵,再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其精明强悍、坚韧不拔的陕西汉子形象中依然传承着“秦风”的文化基因。至于南方,沈从文以《边城》《神巫之爱》《沅陵的人》等“湘西”系列作品追溯楚文学本貌,以粗犷原始的巫楚文化冲击现代都市压抑的“阉寺性”,所沟通的文学意象正是《九歌》中唯美的楚地神灵,实现了当下创作与地域文化精神的紧密相连。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精神一旦形成,就在时空层面获得了不断发展、更新的文学生命,给人类社会的经验和知识领域留下独一无二的思想烙印。

综合以上,地域文学史的价值阐发需构建三维一体的阐释体系,在史料上超越方志思维,建立文献与田野互证的史料系统,在审美上打破文体壁垒,揭示古典意象向现代表达的美学嬗变机制,在精神传承方面,探索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不断建构文化认同,最终推动地域文学史真正成为守护文化多样性、重塑民族精神家园的思想文化载体。

余论:走向地域文学史学的必然及其学术使命

中国地域文学史何以成学?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回应这一宏大的学术命题,地域文学史走向地域文学史学,包含了三种必然:

首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地域文学史研究历经百年嬗变,已从方志艺文志的辑录传统,逐渐发展为具有独立内涵、研究路径、方法论体系的学科方向。其学科化进程遵循“史识→史论→史学”的演进逻辑:早期的地域文学史识为地域文学的发展性和特殊性提供了基本认知,但这种认识程度还不足以指导体系化的地域文学史写作;随着文学史体例的逐渐成熟,能够帮助地域文学史敷衍成篇的“文学进化论”与提供横向考察视野的“环境决定论”组合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推动了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深化。在史识、史论之后,“史学”呼之欲出。地域文学史学将致力于构建与文学地理学有效融合互动的系统理论体系,强调时空维度的有机统一,呼唤新体系下的本体论、对象论、标准论、方法论和影响论,这一研究反映了跨学科研究的必然趋势,也体现了学术思维范式转换的必然。

其次是学理突破的必然。地域文学史学的成熟需完成三重理论突破:一是本体论重构。地域文学史研究应当超越“地域容器论”,确立“空间生产本体论”,通过文学史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双重观照,系统把握地域文学史的内在逻辑,既还原其历史本相,又阐释其空间意义,简言之,即“超越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局限而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②;二是方法论整合。引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其形成机制、空间结构、地域特征及与人文环境的互动关系,回应地域文学的空间性本质与多元解读需求。三是价值论升华。地域文学史学的最终旨归,在于构建中华文明文学谱系的空间阐释体系,推

^① 魏禧:《魏叔子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

^② 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

动其价值取向实现根本性转变：从偏于一隅、自说自话的“文化表彰”，转向立足整体、寻求深层认同的“文明寻根”。本体论重构、方法论整合、价值论升华的三者联动，旨在激活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密码，揭示其深植于不同地域土壤的文明肌理与文化脉动。

最后是现实驱动的必然。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地域文化认同危机，赋予地域文学史学紧迫的现实意义。资本、信息和人口的全球流动加速了文化同质化趋势，独特的本土文化极易被稀释或边缘化。另一方面，当城市化进程消解乡土记忆与方言土壤，当标准化、应试化教育挤压地方知识传承的生存空间，地域文化符号的式微使得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情感逐渐疏离。对此，地域文学史写作应该视为应对这一危机的文化自救行动，从而承担起抵御文化同质化、维护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学术使命。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地域文学史并非封闭保守的自我揄扬，而应以地方性来回应全球性，以乡土叙事触及宽泛意义上的人性价值，在差异中寻求文明对话的多元基础。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曾慨然发问：“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①乃因人文创作与日月山川等“自然之道”互动同构，所谓“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中国地域文学史不是简单的地方文学陈列馆，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解码器。当我们在万千地域星火中，以“地域文学史学”之名重绘中华文明的空间版图时，既是学术自觉的必然，更是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张曦）

Why Regional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a Becomes a Discipline

— Academic Origin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GE Yonghai, PAN Juq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classical period, Chinese regional literary history evolved into a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one origin and two streams”. Rooted in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Classics* and critique of the *Sao Poetry*, it developed along two parallel and complementary tracks: regional literary anthologies and local historical records. Since the modern era, the field began to transform under theoretical influences such as “the theory of distinct northern and southern literatures”. Yang Shurong’s *A History of Chaozhou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1924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regional literary history in this tim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particularly since the 1980s, regional literary history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surge of writing and publishing, characterized by substantial volume, extensive coverage, rich hierarchical levels, and diverse perspectives. However, the discipline has long faced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oretical stagnation, structural homogeneity, blurred boundaries, and self-aggrandizement. Consciously integrating literary geography into it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econstructing its research paradigm—thereby establishing a spatiotemporal analytical framework—is key to overcoming these obstacle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interpreting key regional writers, analyzing critical regional texts, and constructing distinctive regional literary traditions.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efforts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 unearthing local literary documents, aesthetically reconstructing literary texts, and preserving regional cultural spirit.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academic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field, critically reflecting on current challenges, and identifying future breakthrough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lf-standing “Historiography of Reg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crucial for dismantling the homogeneity of grand narratives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revitalizing the creative energy of regional literary traditions.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regional literature, academic origins,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① 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